

## 解放区抗战歌谣创作与流传的特征

王兆辉, 张冰梅, 魏 兵

(重庆图书馆, 重庆 400037)

**摘 要:** 解放区抗战歌谣作为动态的民间文化现象, 不仅体现出政府组织倡导引领的集体性与民众性, 更兼具文艺工作者极富个体性创作的流变特色, 在继承了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与艺术内涵的同时, 又在时空流传过程中不断发生着多元文化的演绎与变异, 体现出集体性与个体性兼容、传承性与变异性贯通的特点。在内容上, 借助于传统民众歌谣抒发情怀、宣泄情感等生活性特点, 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特定时代的军民抗战岁月, 具有生活性和革命性交融的特点。在语言艺术形式上, 除了歌谣所特有的口头性的鲜明特征外, 随着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以及文艺工作者积极参与抗战歌谣的创作, 其书面性的特征也愈来愈明显。

**关 键 词:** 解放区; 抗战歌谣; 创作; 流传; 特征

中图分类号: I 20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2)02-0088-04

### Creation and circulating features of liberated areas resistance ballads

WANG Zhao-hui, ZHANG Bing-mei, WEI Bing

(Chongqing Library, Chongqing 400037, China)

**Abstract:** As a dynamic folk culture, liberated areas resistance ballads not only reflect the avocations of the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but represent the creation of writers and artists, hence, these ballads inherited the culture and ar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changed during the ongoing evolu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variation, and reflected the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Viewing from the content, with the help of traditional popular songs to express feelings or emotions, these ballads, presenting from a different angle the specific times during civil war, have features blending of life and revolutionary. Considering the language arts, in addition to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folk songs, these ballads show obvious written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knowledge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worker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ballad of the war.

**Keywords:** liberated areas; resistance ballads; creation; circulating; features

解放区抗战歌谣是红色革命歌谣在抗战期间的继续和升华。它是在中华民族抗日解放战争的语境下, 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引领, 由全国各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和民间歌谣歌手共同创作, 以抗战为题材, 并在广大军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的歌唱作品。与作家文学及传统民俗文学相比,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流传具有集体性与个体性兼容、传承性与变异性贯通、革命性与斗争性交融、口头性与书面性并举等多方面辩证统一的特征。

### 一、集体性与个体性兼容

传统意义上的民众歌谣大多是人民群众自发的一种集体创作流传, 个体性的创作因子相对式微。但近代以来, 尤其是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传播, 一方面是由官方政府组织来倡导引领, 另一方面大量音乐家、诗人等文艺工作者深入其中, 参与创作演出, 因此, 解放区抗战歌谣作为动态的民间文化现象, 不仅体现出集体性与民众性, 更兼具极富个体性创作的流变特色。

集体与个体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 两者相辅相成, 密不可分。解放区抗战歌谣兼容集体性与个体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收稿日期: 2011-11-02

基金项目: 重庆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2010YBRW87)

作者简介: 王兆辉(1982—), 男, 山东泰安人, 硕士, 馆员, 主要从事文献整理开发与图书馆建设事业研究。

### 1. 集体完成, 个人传唱

解放区抗战歌谣作为一种民众文艺, 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作品在集体的创作与流传过程中, 历经时空逐浪淘沙般的洗礼, 经由人民群众不断加工改造, 集中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 融汇了人民群众思想理念, 蕴含了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 积累了人民群众的艺术技巧。例如有些抗战歌谣就源自于节日的仪式、劳动号子、男女对唱等场合语境中。在集体的生产生活场景、悲壮豪迈的抗战氛围、因战争而产生的离别感伤等等事物情感磁场之中, 人们触景生情, 共同的感受激发出相应的节奏, 唱词随之自然迸发出来。譬如反映陕甘宁边区抗战军民轰轰烈烈大生产运动的《军民大生产》, 就取材于陇东军民集体创作传唱的劳动号子《十唱边区》。这首打夯调子即是军民集体在劳动中随兴填词演唱, 歌中“呀么嗨嗨”、“西哩哩哩嘹啦啦啦唆罗罗罗”等, 既是歌谣的演唱衬词, 也是军民实际生产过程中发出的自然声音的拟声化。这是抗战歌谣流传集体性的体现。同时, 无论是个体或集体创作的抗战歌谣, 必然经由人民群众的传唱演绎。在这个流传过程中, 由于没有条件限制, 传唱者个体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歌谣的加工、修改中来, 使歌谣的内容和形式不断趋于完善, 从而深刻地影响着歌谣创作的集体性。

### 2. 个人创作, 集体流传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个体创作, 集体流传, 一方面, 是个体创作的抗战诗歌等文学文艺作品流传到民间, 演变成民众抗战歌谣。高尔基曾指出: “个体是群体的部分物质力量及其一切知识和一切精神能力的化身。”<sup>[1]</sup>对于解放区抗战歌谣而言, 这个个体是指演绎歌谣的诸多具名或不具名的民间歌手、民间艺人等民众创作者, 以及工农大众的传播者个体。他们在抗战歌谣的创作传唱中, 运用自己的卓越文艺才能, 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独特风格, 从而增加了抗战歌谣的精神魅力。譬如正是受到李增正等农民歌手演唱《移民歌》的感染, 才演绎出经典的《东方红》。这个个体也是指抗战歌谣的形而上的职业的文艺工作者, 如张寒晖、张松如等, 他们通过自己的专业文化素质, 运用文学的、音乐的、舞蹈的、艺术的等专业技术, 丰富了传统民众抗战歌谣的精神内涵。由此, 个体创作与集体流传可谓是相得益彰, 融为一体。

另一方面, 由于中共中央的大力倡导, 吕骥、

贺绿汀、张寒晖、周巍峙、麦新、孟波、安波、郑律成、田间、赵树理等大批文艺界工作者参与到抗战歌谣的专门创作。这自然致使解放区抗战歌谣的个体性创作特征愈发明显。譬如作家赵树理在其主编报纸《中国人》时, 即创作发表了一些抗战歌谣, 如《小学生不学日本话》、《呱呱汪精卫》、《狗尿苔》等, 表现出浓厚的个人创作风格。其中, 《狗尿苔》揭露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汉奸奴才模样, 令人耳目一新:

汪精卫, 狗尿苔,  
愿给鬼子当奴才。  
鬼子尿泡尿, 奴才吹口泡。  
又丢人, 又现眼,  
天生奴才不要脸。<sup>[2]</sup>

## 二、传承性与变异性贯通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传承性与变异性, 亦即抗战歌谣“与时俱进”的特性, 是指抗战歌谣从传统歌谣中继承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艺术内涵, 同时又在时空流传过程中不断发生着演绎与变异。一方面,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集体性和书面性决定了其传承性, 而它的口头性和个体性则决定了其变异性。另一方面, 时代的变迁, 环境的改变, 人文意识的转变等等因素, 也都深刻影响着歌谣的传承与变异性。

所谓“万变不离其宗”,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传承性是指抗战歌谣在流传变异过程中还保持着一些相对稳定的因素, 世代传承, 形成传统。抗战歌谣的传承性架构于一种群体性的程式化思维方式的历史积淀, 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遗传基因意识。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内核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 外在形式则借助各地区民族民众歌唱文化来表现, 从而形成由丰富的多元文化内涵交汇相融的特性。解放区抗战歌谣传承性的特征, 主要体现在歌谣对于传统文化思想观念、创作方式、语言结构、修辞手法等艺术形式的借鉴继承。诸如在生产歌、生活歌、仪式歌等各种类型的歌谣中, 如“四季歌”、“五杯酒”、“十绣”、“十唱”、“十二月歌”等, 比兴法的运用, 语言文字的章法, 句式唱法等被发展成固定的格调。譬如陕甘宁边区抗战歌谣《五杯酒》: “一杯酒, 高举起, 献给领袖毛主席, 二杯酒, 人民心, 献给八路军新四军, 三杯酒, 甜又美, 献给武装工作队……”<sup>[3]</sup>又如《十绣金匾》, “正月里, 闹元宵,

一绣毛主席，二绣陕甘宁，三绣八路军，四绣闹生产……”<sup>[3]</sup>

与此同时，由于民众歌谣本身就是一种活的语言艺术形式，它的创作不同于作家文学，基本没有盈利性目的与版权观念，各地的歌谣传唱者往往随时代的历史语境而随意更改，从而使得抗战歌谣在流传过程中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这便是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变异性。这种变异性必然使解放区抗战歌谣充满生命力，并与时俱进。譬如《十唱边区》即演绎出《十唱解放区》、《军民大生产》等版本，《绣金匾》、《移民歌》、《放哨歌》等也在各地传唱过程中演绎出各具特色的歌谣。

另外，以江淮地域抗日根据地宝应一带的民歌《吃菜要吃白菜心》为例：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新四军爱人民，人民要拥护新四军。  
有恩不报非君子，有仇不报枉为人。  
日寇侵略我中国啊，亡国灭种真伤心。  
同胞啊！人人要参加新四军。<sup>[4]</sup>

同是这首民歌，在江淮其他地区则演绎成不同的异文：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打仗总要打胜仗，从来不欺老百姓。  
老百姓，人人喜爱新四军。  
谁说工农不中用，今朝抗日打先锋。  
为国为民为自己，快快参加新四军。  
新四军，个个爱护老百姓。  
军民合作打日本，赶走鬼子最开心。  
建立幸福新中国，千家万户有田耕。  
有田耕，只要合力打日本。<sup>[4]</sup>

诚然，这异文不仅体现了抗战歌谣的变异性，同样也体现了它们之间的传承性，体现了其传承性和变异性的有机统一。

### 三、生活性与革命性交融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民间歌谣本身起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因而，解放区抗战歌谣的革命性特征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有着天然的联系。20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后，以延安为中心辐射全国各解放区，中国民众歌谣才焕然一新。全面抗战爆发不久，1938年夏天，在音乐家吕驥等人的主持下，于延安鲁艺成立了“民歌研究会”。自

此，解放区抗战歌谣脱胎于传统民众歌谣，曲风为之一变，推陈出新，曲调亦因抗战的革命内容在精气神上有了根本变化。1941年，“中国民歌研究会”更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要从小鲁艺走到大鲁艺中去”，解放区抗战歌谣随之进入深度变革时期。之后，许多专业文艺工作者开始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开始积极投身抗日民族解放革命斗争之中，深入民间生活与生产实践，贯彻落实歌谣创作的革命方针与群众路线，从而促使编创反映解放区军民抗日革命题材的歌谣以空前未有的规模繁荣与兴盛起来。而伴随着“新秧歌运动”等民间文艺运动，解放区抗战歌谣更得到全面的提高和发展。

“各种艺术品都有属于它的时代和民族，各有特殊的环境，依存于特殊的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及其它的观念和目的。”<sup>[5]</sup>解放区抗战歌谣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的政治文化产物，是在中华民族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语境下，由中国共产党倡导与鼓励，并在传统民众歌谣的孕育下产生的。波澜壮阔的抗日民族斗争为传统民众歌谣提供了新的题材、新的内容、新的语言、新的思想内涵，促使中国传统民众歌谣进入转型时期，推动各地民众歌谣的形式与内容、审美特质与思想情感的质的飞跃，逐渐实现解放区民众歌谣的革命性转变，从而揭开了中国红色革命歌谣的新纪元。

借助于传统民众歌谣抒发情怀、宣泄情感等生活性特点，这些或填词式，或改编式，抑或风格化的解放区抗战歌谣大多都是在传统民歌民谣曲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从而使民众歌谣演绎成了民魂战歌，成了抗战的重要武器。如此，解放区抗战歌谣的生活性与革命性的交融特征也就凸现出来。譬如反映解放区军民大生产建设，采用秧歌形式，集体表演的《开荒生产》、《军民大生产》、《南泥湾》等，不仅体现了抗战时期军民紧张战斗与劳动生活的一面，同时也讴歌了军民鱼水深情。其中，《军民大生产》唱道：“解放区(呀么呵嗨)，大生产(呀么呵嗨)，军队和人民(西哩哩，嚓啦啦啦，嗦罗罗罗叭)”，就集中表现了抗战时期热火朝天的军民劳动的战斗场景。又如其他各种沉着有力、振奋人心的劳动号子，《吆号子》、《秋收》、《毛主席号召大生产》等，讴歌了解放区军民披荆斩棘、开荒生产、

坚持抗战的精神面貌,极大感染了人民群众奋不顾身的生产战斗的抗战气氛。再如男女对唱、载歌载舞的《拥军花鼓》唱道:“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了猪羊出呀了门,猪哇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呀路军……”<sup>[6]</sup>歌谣有时采用锣鼓伴奏,有时利用唢呐伴奏的百姓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曲风活泼,情绪欢快热烈,把老百姓与子弟兵在战斗中流露出的和谐生活画面生动展现出来。其他如《闹变工》、《生产谣》、《纺线线》、《做军鞋》、《拥军歌》、《劳军歌》、《桂姐纺线》、《交公粮》等则渲染出解放区全民为抗战提供后勤保障的情景。总之,这些歌谣主题鲜明,反映生活性与革命性的抗战内容是歌唱的主旋律,曲风大多饱满、热情,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特定时代的军民抗战岁月,激发着广大军民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对于全民抗战有着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 四、口头性与书面性并举

民众歌谣起源于实践活动,最初的歌谣都是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口头保存。解放区抗战歌谣作为一种大众化的语言艺术形式,口头性显然也是它鲜明的外部特征。同时,自《诗经》、《乐府诗集》以降,书面性亦成为民众歌谣不断潜移,且易让人忽略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各解放区,随着人民群众掌握文化知识,能够断章识字,以及文艺工作者自觉地积极参与抗战歌谣的创作,这种书面性的特征也愈来愈明显。在解放区抗战歌谣中,有些作品从口头创作而来,有些作品从书面创作而来,但都在口头与书面中广为流传。总之,这些抗战歌谣,书面作品有口语艺术特点,口头作品亦有书面文艺腔调。由此,解放区抗战歌谣口头性与书面性的兼容并包的特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显著水平。

民众歌谣本身是靠口头创作、口耳相传,广泛传播于人民群众之中。譬如著名的陕北歌谣《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就是农民楷模孙万福即兴创作、脱口演唱而出的。解放区抗战歌谣在通过言语表达的同时,更借鉴了文艺工作者编排的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手法,自然地与表演艺术融合在一起,使作品形象鲜明,感情丰富,语言活泼生动,朗朗上口,便于群众口头流传。如陕北的《拥军花鼓》就是采用男女对唱,载歌载舞,为广大军民喜闻乐见,并在各地传唱中演绎出多种形式与内容。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书面性特征则主要表现于作品在报刊上进行发表。如木匠出身的汪庭有即在《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绣金匾》、《表顽固》、《防奸歌》等歌谣。又如被誉为“劳动诗人”的孙万福也在《解放日报》、《陇东报》等报纸上发表了《歌唱毛主席》、《边区人民要一心》、《我们边区象清泉》、《自卫军》、《二流子要转变》、《抗战剧团》等二十余篇歌谣。<sup>[7]</sup>由此可见,解放区抗战歌谣创作的风气非常繁荣,更毋庸说专门从事创作的文艺工作者。而正是由于抗战歌谣这种书面性的特征,才为人们保留了大量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原始素材,并为后人提供了编辑出版完善辑录的历史蓝本。如建国后陆续出版的《中国革命民歌选》(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编,音乐出版社,1958)、《长白山抗战歌谣》(齐兆麟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抗日战争优秀歌曲选》(申保山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革命民歌唱千秋》(施樱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等等。这些抗战歌谣书籍的出版更彰显了解放区抗战歌谣的书面性的时代意义。

综上所述,解放区抗战歌谣诸多特征本身都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而各个特征之间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中,解放区抗战歌谣的传承性与变异性是其在集体性、书面性与个体性、口头性作用于歌谣的创作与流传表现出来的,歌谣的传承性与变异性又反作用于书面性与个体性等特性,而革命性与生活性则是抗战歌谣在内容上的根本特征,这四个特征联系起来就成为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与流传的基本特征。

#### 参考文献:

- [1] 高尔基. 论文学: 续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54.
- [2] 烈风. 狗尿苔[N]. 中国人, 1940-12-25(04).
- [3] 贾芝. 民间文学编[Z].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2: 220, 142.
- [4] 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扬州文史资料[Z].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 161. 226-227.
- [5] 黑格尔. 美学: 第1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19.
- [6] 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 中国革命民歌选[Z]. 北京: 音乐出版社, 1956: 14.
- [7] 刘志宏. 陇东三首民歌唱红全中国[N]. 兰州日报, 2006-12-28(04).

责任编辑: 曾凡盛